

试论《稼轩词》与《庄子》

郑宏华

翻开《稼轩长短句》，不难发现，南宋词人辛弃疾对庄子是多么倾慕：“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读庄子有所思》）；“怎得身似庄周，梦中化蝶，花底人间世”（《念奴娇·和赵国兴知录韵》）；“谁与齐万物？庄周吾梦见之”（《哨遍·秋水观》）。不仅如此，在一部《稼轩词》中，直接、间接引用《庄子》一书的地方，随处可见，俯拾即是。有许多首词，甚至全部化用《庄子》书中的语言和典故。《稼轩词》与《庄子》，正是体现了文学发展的某种渊源关系，值得一谈。

《稼轩词》受《庄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二者在浪漫主义精神气质上是何等的“神交心许”。庄子是哲学家，但他浸入了文学的领域，是一个具有“浪漫的态度，诗的情趣”的“诗人”（《闻一多全集》卷二）。《庄子》一书，内容尽管无比丰富，但基本倾向是大体一致的，给人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庄子对于其理想境界的追求，体现了难以抑制的热情。他幻想了一个超离现实的“无何有之乡”（《逍遥游》），认为那是“旧国旧都，望之畅然”（《则阳》）。为追求这个崇高的绝妙境界，他对宇宙人生进行了艰深的探索，并讲了有名的鲲鹏故事，借用它来比喻“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至人。那堪称“一世之

豪”的辛弃疾呢，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范开·稼轩词序》），他曾多次用庄子的“鲲鹏”形象，或喻人，或自比，抒发他那慷慨激昂的进取精神。在《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赋》中，他开头就写道：“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以鲲鹏的形象比喻主张抗战的史正志，并希望他“袖手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实际上，这当中寄托了辛弃疾自己的愿望。他怀念沦陷中的西北故土，要想“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太常引》）。即使己志不伸，仍然要“看云霄高处，鹏翼徘徊”（《沁园春·送赵景明知县东归》），在怅惘中隐含着无限的期待。范廓之秋试，他以“鹏北海”作比相送；病起答谢友人时，他以“垂天自有扶摇力”相勉；“庆韩南涧尚书七十”的《水调歌头》，更以赞美的笔调写道：“看取垂天云翼，九万里风在下，与造物同游。”总之，辛弃疾与庄子，尽管所处的时代不同，所向往的也各异，但在浪漫主义追求理想境界的基本精神上却是非常相通的。

大凡浪漫主义作家，他们一方面执着于对理想境界的追求，而另一方面又对现实给予抨击，并表现出极大的愤慨。我们读《庄子》，知道庄子提出的理想带有虚无色彩，但他对现实的认识是清醒的，批判是尖刻的。

处于南宋的辛弃疾，他有理想，有抱负，一心要完成统一大业，但当时的南宋政权，偏安江南，醉生梦死，“直把杭州作汴州”，对辛弃疾这样的人，不但不重用，反而想方设法的排挤他。对于这样的现实，辛弃疾用辛辣、犀利的笔调，冷嘲热骂的口吻，给予嘲讽，提出抗议。他虽然始终寄希望于上层统治者，但也表现了大不敬的心理：“君恩重，教且种芙蓉”（《小重山》）。对于那些贪权误国的官僚，更表现出愤激：“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这是为庆祝韩元吉的寿辰而作的《水龙吟》，借王衍之名，骂当今之世不是显而易见吗？当时有个叫赵晋臣的人，与辛弃疾等人作词唱和，但“以兄弟皆有职名为宠，词中颇叙其盛”，辛弃疾作《洞仙歌》嘲讽道：“旧交平贱，大半成新贵。冠盖门前几行李。看匆匆晒笑，争出山来，凭谁问：小草何如远志。悠悠今古事，得丧乘除，暮四朝三又何异。任掀天事业，冠古文章，有几个，笙歌晚岁。况满屋，貂蝉未为荣，记裂土分茅，是公家世。”全首词句句带刺，特别是“暮四朝三”的巧妙运用，更见其有力。“暮四朝三”，是《庄子·齐物论》中一个有趣的寓言故事，讽刺那“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的短见。辛弃疾用于此处，真是痛快淋漓，可谓“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永遇乐·戏赋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调》）。这种愤世嫉俗的态度，说他直接承受于《庄子》，也不为过。

辛弃疾的抱负无可施行，他大感英雄无用武之地，他愤懑、怨怒，除了像上面那样指斥现实之外，还大量运用《庄子》书中的语言、典故来排遣、发泄。他感叹自己是“落我材无所用”（《满江红·

和卢国华》），“材不材间过此生”（《鹧鸪天·博山寺作》）。在《哨遍·秋水观》中，全篇申用《庄子》，反复、曲折地表达了这种心情：

“蜗角斗争，左触右蛮，一战连千里。君试思，方寸此心微，总虚空并包无际。喻此理，何言泰山毫末，从来天地一稊米。嗟小大相形，鸩鹏自乐，之二虫又何知？记跖行仁义孔丘非；更殇乐长年老彭悲。火鼠论寒，冰蚕语热，定谁同异。噫，贵贱随时，连城才换一羊皮。谁与齐万物？庄周吾梦见之。正商略遗篇，翩然顾笑，空堂梦觉题秋水。有客问洪河，百川灌雨，泾流不辨崖浚。於是焉河伯欣然喜，以天下之美尽在己。渺沧溟，望洋东视，逡巡向若惊叹，谓我非逢子，大方达观之家未免，长见悠然笑耳。此堂之水几何其？但清溪，一曲而已。

前面说过，辛弃疾曾把“鲲鹏”写成不可一世的英雄，这首词却“鸩鹏”相等，而且全篇文字迷离恍惚，不知所云。但细细读，来，当中包含着他的满腔悲愤，可以说是以自嘲的口吻，向统治集团提出的抗议。在另一首《哨遍》题鱼计亭中，更体现了辛弃疾的这种用心。词的前面，辛弃疾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说明他不同意司马彪关于《庄子·徐无鬼》中“於蟻弃知，於鱼得计，於羊弃意”的解释，但他自己“反复寻绎，终未能得”，于是写下疑词。在这首词的下半阙，辛弃疾就这个问题便大大的发挥了一通：

噫。子固非鱼，鱼之为计子焉知。河水深且广，风涛万顷堪依。有网罟如云，鸩鹢成阵，过而留计应非。其外海茫茫，下有龙伯，饥时一啖千里。更任公五十犗为饵，使海上人人厌腥味。似鲲鹏，变化能几。东游入海此计，直以命为嬉。古来谬算狂图，五鼎烹死，指为平地。嗟鱼欲事远游时，请三思，而行可矣。

这里，顺手拈来几个《庄子》书中写到鱼以及有关的故事，描绘了一个十分险恶的环境，大有走投无路之感慨。显然，当中隐含了辛弃疾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且那不满现实的情绪也已经跃然于纸上了。

我们探讨了《庄子》与《稼轩词》在精神气质上的某些联系，而就艺术手法来说，《稼轩词》对《庄子》也是有所继承的。我们读《稼轩词》，仅就上面所谈，也足以看出，他是多么纯熟地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想象与夸张，词人的思想飞越时间、空间的限制，“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文赋》），把宇宙中那些似乎毫无联系的许多事物，构成一个个完整的艺术形象，调配成一幅幅深广的艺术意境，给人博大开阔的感觉，真可谓“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而“足以启人意”（《陈模子宏·论稼轩词》）。在这一点上，《稼轩词》得力于《庄子》的地方也不少。我们知道，《庄子》一书，那丰富的想象，怪诞的夸张，包举宇宙的广阔胸襟，是多么的令人神往。然而，这样的神妙境界，我们能从《稼轩词》中窥见其影子。“鹏翼垂空”（《满江红》），“野马尘埃，扶摇下视，苍然如许”（《水龙吟》），这是自《庄子·逍遥游》脱胎；“造物故豪纵，千里玉鸾飞”（《水调歌头·和王正之右司吴江观雪见寄》），又与“伟哉造物”有缘。《玉楼春·戏赋云山》：“何人半夜推山去？四面浮云猜是汝。常时相对两三峰，走遍溪头无觅处。”《归朝欢·丁卯岁寄题眉山李参政石林》：“野老时逢山鬼泣，谁夜持山去难觅。”神奇的想象，大胆的夸张，读来趣味横生。然而，它的本源亦是出自《庄子·大宗师》里的这样一段话：“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直接化用其句

或借用意境的是如此，而那些反用其事或借题发挥的，也不能不说是受了启示而扩大了想象的广阔天地。《哨遍·秋水观》与题鱼计亭自不必说，《稼轩词》中有一首《木兰花慢》咏中秋月：“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天根谁系？娥不嫁谁留？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虾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多么丰富的想象力！难怪后人说他已猜到地球是圆形的。这首词辛弃疾虽标明是用“天问体”写的，但探索的精神，谐趣的口吻，与《庄子·天运》里的一段文字，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天其处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在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

辛弃疾在《汉宫春·会稽蓬莱宫怀古》中有这样的句子：“秦望山头，看乱云急雨，倒立江湖。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这里，他直接化用了《天运》中的句子，因此而论之，《木兰花慢》的“问”与《天运》的“问”是有意境上的联系的。

《庄子》一书的语言，历来被人称道。“洋”“恣纵”，“诡”“参差”，是《庄子》语言的基本特点。辛弃疾是词人，我们讨论的也是他的词，似乎在语言形式上不同种类，但文学各部分之间是要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稼轩词》本身表现出来的语言特点，也可以看出他与《庄子》的继承关系。“谁识稼轩

心事，似风乎舞雩之下。回头落日，苍茫万里，尘埃野马。更想隆中，卧龙千尺，高吟才罢。倩何人与问：“雷鸣瓦釜，甚黄钟哑？”（《水龙吟·用瓢泉韵戏陈仁和，兼简诸葛元亮，且督和词》）。这样的大开大合，起伏跳跃，说是“洋”“恣纵”，也当之无愧。《稼轩词》六百多首，长调、短调运用自如。不仅“爱用响韵”，声调铿锵，而且在具体的词句中音节错落，打破格律限制，要说“参差”，自然无差。况且这也是词本身的句法特点。谈到“诡”，前面论其批判现实有所涉及。在《稼轩词》中，标有“戏赋”、“以嘲”的篇目不少，而语言确实具有“戏之”、“嘲之”的特点。《千年调·蔗小阁名日卮言，作此词以嘲之》：“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滑稽坐上，对更鸱夷笑。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多么诙谐有趣而又形象生动，把那些趋炎附势的奴才嘴脸，画得维妙维肖。这样的语言风格，与《庄子》的某些篇章“和之以天倪”，真是难解难分。难怪范开评价辛弃疾的词，都要借用《庄子》语言：“故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处变态，无非可观”（《稼轩词序》）。《稼轩词》全用、化用《庄子》一书的语言那么多，而且赞赏备至：“会说忘言始知道，万言千语，不自能忘堪笑”（《感皇恩》），可见他是何等的欣赏《庄子》语言并纯熟地取之为己所用。当然，《稼轩词》中用《庄子》，有顺手拈来，浑然一体，组成新的艺术形象而别具风格的，但也有那种“用庄语”发议论，觉得像文字游戏而形象不够鲜明的。如《卜算子·用庄语》：

“一以我为牛，一以我为马。人与之名受不辞，善学庄周者。江海任虚舟，风雨从飘瓦。醉者乘车坠不伤，全得于天也。”像这样的词，不能不看成是“掉书袋”的弊病。

我们上面探讨了《庄子》对《稼轩词》从精神气质到艺术手法各方面的影响。同时，也须看到，《庄子》哲学中的消极面也是对他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的，特别是当他不得志而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时，那“乐天知命”、“人生如梦”的东西便成了他的精神支柱。《庄子·知北游》中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从“无穷宇宙”来说，人的一生确是非常短暂的，但《庄子》的这段话，很容易导致人走向消极面，辛弃疾就借用过来抒发自己这方面的感慨：“万事云烟忽过”（《西江月·示儿曹，以家事付之》），“人似浮云影不留”（《鹧鸪天·和人韵，有所赠》）。《兰陵王》写梦境，“取古之怨愤变化异物等事”，发泄他的恨：“恨之极，恨极消磨不得。

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郑人缓也泣：‘吾文，攻儒助墨。十年梦，沉痛化余，秋柏之间既为实。’（弘·郑人缓的事迹均出自《庄子》）但他最后的归结却是：“寻思人世，只合化，梦中蝶。”《水调歌头·题永丰杨少游提点一枝堂》更运用郭象等人注《庄子》“齐小大”，“均异趣”的观点，表现人生如梦的情绪：“万事几时足，日月自西东。无穷宇宙，人是一粟太仓中。一葛一裘经岁，一钵一瓶终日，老子旧家风。更着一杯酒，梦觉大槐宫。记当年，腐鼠，叹冥鸿。衣冠神武门外，惊倒几儿童。休说须弥芥子，看取鲲鹏斥鷃，小大若为同？君欲论齐物，须访一枝翁。”词中有一股怨怒之气，但不否认也含有“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消极（转第69页）

限制，也同样决定了他们作为表现主体时所确定的叙事方式。尽管人们始终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历史的内部联系与其外部建筑艺术在史学与文学中的和谐统一，但这种追求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不得不体现为一个过程。纵观中国史学与小说的发展，叙事方式不外纪传式与通鉴式两种。前者以人物为圆心，以其活动为半径，有选择地把相关人物和事件组织在同一圆环之中，从而使叙事结构在纵的方向上表现出单线式的，在横的方向上表现出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的特点。后者以事件为主干，把参与其间的人物及相关事件会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叙事结构在纵的方向上表现出复线式的，在横的方向上表现出开放式或半开放式的特点。前者显然较后者更容易驾取得多。从中国史学在先秦时期尝试的各种体例，到两汉史家确立的纪传体，再到宋代史家创造的通鉴体和纪事本末体；从先秦史书、诸子孕育的小说萌芽，到汉末魏晋的纪传式小说，再到宋元已初具会通精神的话本小说以及其后的通鉴式长篇小说，恰好生动地展现了叙事方式由以人物为中心到以事件为中心的递变过程。这个过程，正是与人类在认识和叙述自己的历史活动方面，占有、综合、分析、运用材

料的能力的发展程度相适应，这就是我们对现象的实质作更深一个层次的探讨而得到的结论。

最后，还想补充说明的是，人类兼具继承与创造两大功能。无论是在史学或小说的领域内，人们具备了更高的叙事能力之后，并不意味着将彻底抛弃自己曾经选择过的形式。宋元以后，除通鉴体，纪事本末体相沿不绝外，纪传体史书仍保持了它在正史中的传统地位；元明之际，除了以事件提挈人物的长篇小说成为小说的主流外，纪传式的小说仍以各种形式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表现形式。有的长篇小说如《水浒传》、《儒林外史》，更体现了作者对两种表现形式加以融会贯通的企图。它们的结构，颇类扩大了《史记》、《新五代史》中的合传或类传，是不同程度地对纪传形式或连锁、或重迭的运用，其人物形象的序列，最终都会通于作者所表现的主题。直到《红楼梦》的出现，揭开了中国近代小说的序幕，显示出中国小说包括结构形式在内的艺术表现方法有了质的突破，然而这已非本文的主题。笔者最终想说明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结构与历史编纂形式始终是与人们叙事能力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

（接第73页）情绪。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辛弃疾不可能看到人民大众的力量，所以，他被排挤了，不受重用了，就一切都黯淡了。在这种状况下，接受《庄子》哲学中的消极面也是十分自然的。

任何作家的创作都不是凭空的，他对前代作家的创作资料都是有所借鉴的。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辛弃疾读书十分广博，出则“搜罗万象”，入则“驰骋百家”（刘宰《漫塘文集》卷十五《贺辛待制知镇江启》），他

正是积累和吸收了前人（包括《庄子》在内）的丰富资料之后，结合自己在此时此地的特殊感受，创作出了新的艺术珍品。

总而言之，《庄子》以丰富的文学色彩影响后世，也和屈原的作品一样，可以说是“衣被辞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我们可以从《稼轩词》中略见其一斑。另一方面，后世文学的繁荣，有待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稼轩词》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也值得我们认真借鉴。